

梁老师的笑

陆建德

制订桥牌规则的人真是了不起，比如奖惩制度因“有局”“无局”而异，给牌局增添了兴奋点。“有局”的英文是“vulnerable”，中文里缺少对应的概念。我初学时出牌犹豫，生怕梁老师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。如何飞牌(finesse)，如何紧逼(squeeze)，背后有很多讲究。如果我们约定，我宁可做“Dummy”，即亮出一手牌的“明手”，由梁老师即庄家主打，“明手”不必多动脑筋，静观庄家如何出牌，细细体会，牌艺就一点点提高了。我起初一局打完，记不住自己拿过的牌，梁老师说我出牌次序错了，应该如何如何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非常恐慌。我当时对梁老师的记性极其佩服，后来牌打得多了，就知道记牌并不难，就像下完围棋复盘一样。

那时桥牌输赢的计分比较简单，不贴点，牌好赢面就大。梁老师拿到一手好牌，眼里就放射出光芒，笑眯眯地望着我，暗示必须打成局。他身体前倾，把我家不甚坚固的腰圆形凳子支起来。凳子两条腿凌空，两条腿承载着他和，吱吱嘎嘎地响起来抗议。老实说，我一看到梁老师脸上充满喜悦期待的微笑，心里就紧张异常。严格地说，梁老师喜形于色，有犯规之嫌，不过我们当时打牌，都有人关注搭档的面部表情。难怪现在正式的桥牌比赛上，选手们是看不到对方的。轮到我做庄家的时候，梁老师就会站起来走到我身后指挥出牌。有一次我们打成大满贯，梁老师笑得像灵隐飞来峰上的石弥勒佛。面对棋牌，成人都会变成孩子。

七十年代中期，我有时骑车去杭州大学看梁老师。他住的那栋楼在天目山路老杭大的东南角，楼外就是杭大围墙。在围墙与天目山路之间大概还有十几米的距离，附近的农民见缝插针，种一些菜。梁老师住的一楼，他的兰林车就停放在走道上。房间朝南，不小，靠南窗的单人床木床架子上搁着一张尺寸偏大的灰条子席梦思，外面套着散漫的被单。那张席梦思大概用了很久，过于松软了，梁老师的身陷在里面，呵呵呵的，无比舒服的样子。他有幸做个“逍遥派”，经常从图书馆借英文小说来读。有一次他告诉我，他手里拿着的是“Westward Ho”，讲的是几百年前英国人的海外冒险，非常不错。这本书的作者金斯利，我以前从未听说过。我从他那里借过一本美国四十年代出版的英国诗选，深灰色精装，编者是路易思·恩特梅尔(1885-1977)。那本诗选有一篇较长的前言，我还试着翻译，没有翻完。我那时粗识英文，还抄录了一些诗篇。诗选里有一些诗作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读到约翰·梅斯菲尔德(1878-1967)的“Sea Fever”(有人译为《海之恋》)的一个读过一点旧诗词的少年读者来说，那是一种完全新奇的感觉。诗中的“我”才十几岁，就像《鲁迅漂泊流记》的叙述者那样，家里呆不住，只想着遨游四海，与浪花和白帆为伴。一位海边少年纯粹的航海渴望，与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之类伪饰的做官“抱负”形成对比。

梁老师还给我看过他在华师大校园里拍的照片。我心里奇怪，他怎么读本科的时候头顶就有点谢了。他说到华师大是很自豪的：“华师大的校园，没有一家上海的大学比得上。”我在复旦就读时曾参加过上海高校外文系戏剧会演去过大华，丽娃河确实远胜复旦老校区外文系和国政系两栋小楼后面的“小桥流水”，而且，华师大英语专业师生的水平让我羡慕。

1978年夏，梁老师得知我考取复旦，非常高兴。大概就在那个暑假他调回上海，还继续做英语老师，学校不大有名。复旦开学不久，我就去梁老师家拜访。此前他给了我两个地址，一个在富民路，另一个在愚园路。某个周末我去他家富民路的住处，想必是穿了蓝卡其中山装，还不会忘记佩戴上复旦的校徽。印象中那栋楼房外墙是奶黄色的。梁老师带我走到楼上见他父亲，他们之间的对话，我彻底听不懂，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粤语。他家的家具少得出奇，也许那时“落实政策”不久，能回到像样的地方住住就心满意足了。至于抄家时“充公”的红木家具究竟去了何处，不大问得出口。当时梁老师正在办出国，此前他与杭大外文系另一位上海教师姚中合作，翻译出版了英国人奥邓肯编的《情景对话：英语日常口语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79年)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这一类书籍非常热销。

此后就和梁老师失去了联系。七十年代后期不少上海人出国，准备一去不返，对自己家的住房，往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，后来懊悔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梁老师的两处寓所，但愿没有轻易放弃。

近日才发现，我七八年前在北京买的一辆便宜旧车，龙头下的商标居然赫然写着“三枪”，没有图案，车身上还印有这两个字的汉语拼音。印象中三枪牌与兰林牌齐名，商标是三杆来福枪。此三枪非彼三枪？下次去上海，应该寻访梁老师的沪上旧址，也许他又回国重做上海人了。我首先要告诉他，桥牌早已不打，不过骑的自行车名称响亮，也许是中英合资的，牌子Sanqiang，可与他正宗的兰林一比呢。

梁老师大笑：“哈哈！Sanqiang！哪有格样子事！”

我相信一个神秘定律：声气相契的人，总会有冥冥中的缘分注定相逢，甚至互相牵系在一起。比如，我与谷林先生“缔交”，是陆贻“为介”(先生后来回顾时的信中原语)；与扬之水接上头，则是谷林先生作伐。——几个人又互为好友。

与林、水的交集，在我这里，最初是2000年初写了一篇关于周作人古希腊译事的文章，寄呈谷林先生指正，信中并提到听说扬之水《诗经名物新证》出版，但遍寻不获，遂请先生帮忙。——其时，与先生通信结为忘年交已两载，而对扬之水，则亦早就私爱其文、遥仰其学，且知道先生与水公过从甚密。

谷林翁在2000年3月6日的复信中，乃因我文而谈到他喜爱知堂，可是杂览多家，自谦“嗜欲太多”，“从吾所好”却“多歧亡羊”，导致治学根柢不深；由此赞扬之水：“丽雅(按：扬之水本名赵丽雅)考证诗经名物，真个是尽弃其学而学焉”；“丽雅的诗经名物考写定了，我还只是念了‘关雎鸠’。”他关心我那篇文章投往何处，说可以等“丽雅来问问她的意见”，看有什么门路帮我发表；也告知其时《诗经名物新证》尚未上市。

三天后的3月9日，先生又写来一张明信片：“昨日扬之水君见过，《新证》已出书，我业告以尊址，书当由彼寄呈。尚有《诗经别裁》书未及回禀已卒业待印否，兄收到新证后可一问。”并附了扬之水的地址。——我由此遂得与水公结缘。

扬之水是谷林先生来信中经常谈到的，以下再选录一些有实质内容、能见其人的段落，或可作本书正文的一点侧面补充，看看林翁在与水公的鸿雁对谈之外，与我书翰私语中是如何评说这位密友。

2001年2月26日信：“老是牵挂着你的扬之水特写，不知是素描还是彩笔。张中行先生的《负暄三话》中曾有一个长篇，昨天重看了一遍，篇末自记云，戴先生两次来信称道之，我读后也认为很好。我未曾问过丽雅自己对此文的评价，也不知丽雅是先认识张先生还是先认识我的。丽雅除扬之水之外，尚有于飞等好几个源于《诗》的笔名，昨天重阅‘三话’，始知宋远亦出于此，先前读此篇似乎把这一句忽略了。(……)张先生文中写丽雅过访，用‘照例不坐’四字，最为言简意赅，而又十分生动，始信张先生云他未有写小说并不是不会写云云诚非虚言也。”

同年3月18日信，对我寄去的关于扬之水的文章草稿作了一些文字订正，然后写道：“丽雅与我在历史博物馆共事，当时并不认识，读《负暄三话》后始知道。《读书》创刊后，因与倪子明兄相熟，又住在同院，与《读书》的关系，悉与子明兄交接，数年未曾认识她。自与她相识，承其殷厚，如杂写小册(按：指《书边杂写》)，即系她一手促成。其时我住在北京医院等胃肿瘤切除手术，此书出版，丽雅持之来院，实‘书趣文丛’问世之第一件也。我躺在病床上，默无一言，想起徐调孚病逝前不久，中华书局同人火急赶印其旧作《人间词语注释》，也是赶出来送到他的病床上的，古籍整理专刊上我读过中华同人所写的纪念文章：徐调孚接过读，反复看，笑着说：真高兴，真高兴！丽雅又虑及我医院恐有急需，又为预支稿酬，另外开支交给校对。凡此我均未一言道谢，盖辞不能达意。吾弟此作，盛称其才，更感重其情，可谓深得吾心焉。要我提意见，草草看过，而原著两种犹未卒读，如何提得出意见来？丽雅先前曾有一次约我写序，我推辞了，据丽雅说，我允诺过要给她的一本书写一则随笔，我都忘了，是为轻诺寡信。吾弟‘报德’之辞，读之如被猛击一拳。”

以上情形，他此后还一再说到。

2002年1月30日信，由《书边杂写》的陈原序谈起：“先是订教与脉望有约，编入‘书趣文丛’的每一种，都要有‘名家’序，还排了名家的座次：第一、季羨林，第二、金克木……。我缴稿时无序，脉望问我道：‘如果我代你求得一序，你反对吗？’我岂能那一般谓介，拒人千里，自然就接受了，但事先既不知求自何方尊者，也没有得窥真经。因胃肿瘤切除手术住院，脉望唯恐意外，此书乃提先当做此辑的首冲抢印出来，并亲送来至病床。”

至于推辞为扬之水作序，2002年10月16日信从另一角度谈过：“范用有一次托人给我带来一本书，我打开一看，是邓云乡的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，附信说：可以写一篇书话。其实我早就买了这本书，只因前面第一篇谢老的序言，读后倒了胃口，就把此书搁下，不想读它了。以后我发现邓君有好事为之作序之癖，他的书前常不止一篇序，记得《日知录》尚称一书不可两序，看来顾炎武自有道理，邓君本人的文字极佳，我因范用之荐，才未与之相失，以见其书必买，而其书前挽人所写的序言每不能与其书相称。赵丽雅早先编她自己的书话曾约我作序，我推辞了，颇惹她生气，我向她说明上面这点经验，她也不爱听。”

2003年9月12日信：“扬之水在《万象》接连有‘大’作，你北来之事不知告诉了谁没有。她在张中行的特写里是‘照例不坐’，给我送书或带信辄留在收发室，所以是‘过门不入’，除了几次施庵约她回来见访，此外便‘翩若惊鸿’了。不过决非耿介外人，每每大声言笑，不让须眉。”

2004年8月26日信，谈与友人间的书物往来：“扬之水则又几次送过来退回去，《古今》合订本‘来去’了几个回合，当《读书》编辑部犹在敝寓对街，我曾让外孙随我抱着《两汉书》的补注本送到她那儿去，第二天她竟抱了她的自藏本送还，说‘我们交换一下’(这自然又显见我的冒失)！”

2005年3月27日信，谈他写给扬之水、止庵和我的书信之结果，“书名经止庵拟作‘简札三叠’，他说征询过扬之水，扬公以为叫起来响亮，她很称赏。”(按：后来出版时的正式书名是《书简三叠》)又：“费孝通一事，在致扬信中也谈过，上回她与止庵同来时我拟抽删，她却主张保存，止庵似在两可之间，听止庵定夺去吧。”

2007年丁亥重阳信：“上次握手后，止庵、丽雅均无音闻。丽雅自《读书》创刊即相交识，至今积三十年，我就未去过她的住处，你这回远道而来，仓促之间竟留下如许相片，思之惊悚。荆公诗云：‘岂无佳宾客，欲往心独懒’，只因为‘北窗古人篇，一读三四反。’我则两度之，岂非衰惫之极，无可救药也。”

另有一通旧函，可与上述照应，2003年11月9日信：“扬之水住处离五十年代初的旧出版总署、新华总店不远，即总后胡同东头，我脚懒，相识廿余年，没有去过她家。止庵的住处我更找不到了，据他说，大约来回一趟便要三个小时，如有所商询，真不如写一封信更好——而多留几行笔

林下水痕

沈胜衣

墨，得间翻看，愈为有趣了。”

由此衍生一下，非涉水公，另抄一点谷林先生对书信的看法。2004年6月26日来信中说：“印书翰一事，早先几个熟朋友在闲谈或来信偶然提起过，我则一直也只当‘闲话’听之。它如值得印行，应起两点作用，一则是提供史料，二则是其作者已属后之读者的研究对象；而我与这两点相距遥远，断无全部搜拾印出的道理。偶有亲旧在此中得少趣味，不是生平书札的全部，而且也不是一通长信首尾悉具的通体，无非小品随笔中偶有隽语可以会心一笑的段落而已。”

——谷林先生的尺牍，不说“史料”和“研究”的价值，仅仅是这份现今不会复有的“意趣”、“情味”(真的，再没有人那样写信、和写那样的信了吧)，已足珍贵。

先生对我所谈书信观，还有几句我特别喜欢，是1999年10月11日信：“我们既不议论军国大事，又非对账索欠，殊无急匆匆赶得满头大汗之必要，尽不妨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。命题作文，步韵和诗，有问必答，针锋相对，自不属于书笺往还的范畴。一下子岔开去说些天外飞来不着边际的闲话，猝不及料，或者反倒能赢得些许出于意表的欢喜。”

类似意思，谷林先生直到2008年8月15日信中仍谈到：“我俩的来书往札，确非一问一答，尽可各说各自的话，这样乃更多真情实意。”——只是，从此以后再未能这样真情实意地来书往札各说各话了，这是他写来的最后一封信。

现在扬之水将与谷林先生的通信结束，那是比我更久远更丰盈的情意，更足珍视。书题《爱书来》，先生1999年5月29日给我的信中也曾说过：“十七日接奉八日手书，欠账多日了。‘惯迟作答爱书来’，梅村是祭酒，可以么说，我当然不能引来作为前例而自解。其实我倒也不一定‘惯’，(……)或则还略略保存一点儿向上争胜的念头，有那么一点精神，希望复信能稍具体面，与来书总不能旗鼓相当，也还堪入目，不至于惹人耻笑。”

说到题目，关于本文，“林下水痕”，起因固然是以谷林、扬之水二人名字取巧，但确定下来后，重读谷林先生给我的手札，发现他一再提到退休后的“林下生活”。特别是2001年立秋后三日信中，抄录了后山居士的《寄答秦州曾侍郎》，前半截是：“千里驰诗慰别离，诗来吟咏转悲思。静中取适庸非计，林下相从会有时。”——甚感天意缘分，让我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先生“林下相从”，这是我的莫大幸运。

关于重读手札，这已不知是第几回了，又多得一次情致氤氲。当中固有沉吟惆怅，但最直接的感觉是一句老话：如坐春风。与这样的长者十余年的交流，真好真舒泰。或嫌那四字老话太滥俗，那就转引谷林先生自己的言语，他在2004年5月23日信中提到，重见戴子钦寄回给他的早年旧信，“佳迹浮动，为之神往。”我的感受亦正如此。

这次是因写此跋而重览先生历年来信，但下笔前却没有先读本书正文的尺牍，反正我作为后辈也不适合去评鉴林、水之间的通问，那就正不妨不受他们的影响而自说自话。然而，最后还是忍不住，在书稿中检索了林

翁致水公信里谈到我的内容。看过之后，却还是如前引谷林先生之于扬之水：“默无一言”了。再具体一点吧，因为这本《爱书来》牵连所及忆起与先生相交的“佳迹”，那种心底回环的情形，仿佛谷林先生之于他一位师长——先生给我的信，多次谈到他的早年经历，一再谈及高中的国文老师，对他从学业上到后来工作、生活中的扶持帮助，其中1999年12月11日信中这样写：

“毕业时节，师生在教室里聚了一次餐(学校食堂操作，备酒)。席散，老师略有酒意，拉我到扶梯下说了几句悄悄话，提出两个要点：一是说我去工作以后，不管遭遇什么困难，都可找他商量；二是希望另外商谈一次，研究能否继续升学。我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对答不上，也从来不曾指望过能听人世间听到这般温暖贴的语言，眼眶里满是泪水，怎样也强忍不住流淌。(……)这位老师在‘文革’开始前病故，这是我在人间欠下的第一笔情债，无法清偿。他给予我的震动自然极为巨大，使我至今于进退取舍之间，常常要惭愧地自责：我的道德品位太低下了。”——嗯，一模一样的，这就是我重温谷林先生来信(包括他给扬之水去信提及我之处)的心情。越是深重的恩义，越只能如此。

深重的东西只放在深心记取吧，我以前写过近十篇有评论性质的关于谷林先生的专文，这回就基本只取知堂抄书体了。抄的还都不是本书正文的书简，要请水公和出版社原谅我这“岔开去不着边际”的跋文。

还要感谢水公和出版社，让我有机会在谷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(12月)、逝世十周年(1月)的这个特别年份，留下个人的一点点微痕。但如前述，对于先生，请恕我无法多说什么了，倒是想再夹带一点其他“私货”，关于水痕之外的另一份心痕。

今年初，谷林先生仙游十载的那天，恰是我一位好兄弟周生出差之日，伤哉！我所得第一本先生的书，《书边杂写》，最先是周生送我的初版，因为他知道我对其先生的推崇，而作为大学同窗、多年好友，彼此同道中人、气息相投，他也是喜爱谷林翁的文章才会买来赠我。后来我结识了谷林先生，想请先生在书上写几句话，先生则另赠我重印本，于卷末写下题跋。此事我曾留在旧文谈过，但没有引题语全文，今录如下：

此旧作之第二次印本，误植略有更正，亦未能尽扫也。胜衣将北来，先期寄其八年得诸佛山周君之初印本令余补识数语，留为纪念，感沁心脾，辞穷难宣。年来殷勤赐教，积藏盈篋，时时回环，亦不暇从末细数。胜衣笃好声诗书画，皆非余所娴习，而于余一意拳拳，自是宿世因缘。晤会无多，但有驰系，聊志两语，持赠此卷：淡墨斜行情未了，老怀旧谊托书邮。癸未秋分后一日，记于北京。劳柯。

这应该是谷林翁与周生唯一的交集。他们都是启我我至深至厚的人，我未能两位做过什么，惟在铭感与痛惜之余，愿他们天上相逢。——会的，以他们日子的巧合，以他们可谈得来的书生本色。

借此再重复开头的说法：声气相契的人，总会冥冥中注定相遇、相牵。就像这本《爱书来》，除却扬之水，整理者秦秦、责编陈飞雪，与我这个作跋者，彼此之间原亦皆各有旧谊，如今围绕着谷林先生的书邮，得以纸上相聚。

如此，愿本书这些旧时鸿雁所展示的、谷林先生那份“淡墨斜行”的书人情致，也在世间牵系更多的同好。会的。

2019年9月8日，白露。——白露的物候是“鸿雁来”，为这本鸿雁之书写下此跋，亦为宜焉。

(《爱书来：扬之水存谷林信札》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)



窗外(国画)黄朋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